

## 獬豸的前世今生及其他

□ 陈懿新



## 缘起、文字

走进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铜制壁雕,壁雕构图粗犷大气,肃穆庄重。西夏王陵、黄河水车和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诉说着银川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雄浑连绵的贺兰山是银川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所推崇的“执法如山”精神的象征。在壁雕的上方有两个不同字体的“法”字,两个法字如日月辉映,象征着中国古代各族人民法律文明的交融。同时两个“法”字也犹如护法的金刚,守卫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壁雕的右上方是西夏文的“法”字(见图1)。宋仁宗景祐3年即1036年,元昊为了巩固党项族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地表征,在建立西夏国之前的大庆元年,颁行创制一种新文字,尊为“国书”,该“国书”就是被后人称为神秘文字的西夏文。西夏仁宗乾佑21年,即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编著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刊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它的出现使夏汉文字及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中原文明也通过文字的交流走入了大漠的起起伏伏。当西夏国被蒙古铁骑踏碎在历史的尘埃中,西夏文字也流落民间在党项族后裔中流传。到明代末年,西夏文因党项族后裔的汉化及与其它民族的融合,而逐渐失传。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古探险活动,掠夺文物,掘获大批西夏文印钞书籍,盗运而去,其中就有《番汉合时掌中珠》。1914年,古文字学家罗福成、罗福萼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得到《番汉合时掌中珠》,罗氏弟兄开始研究西夏文

字,西夏文字在数百年后重新得以传承。在这本书中,记载有对西夏法律制度的叙述,人们也是通过这本书真正认识了西夏文字。通过对西夏文字的学习,史学家们翻译了《天盛年改新定律令》、《光定猪年新法》等西夏法典,使后世知道了西夏法律文明曾有的辉煌。在壁雕的左上方,是“法”字的古体“灋”(见图2)。“灋”字首见于周代金文,目前发现的共有七例,其中一处解释为“大”,是“大孟鼎”中“灋得先王”一句中的用法,其余六例都出现在“勿灋朕令”这一句式,表示的是“去除,废弃”的意思。如果从文字学的视角去对“灋”字作以研究,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无疑是最著名的了,在其编著的《说文解字》中,对“灋”如此注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此注释即镌刻在壁雕之上。“灋”以水为形,寓意“平之如水”,象征均平公正,“灋”中有“廌”,《说文解字》解释,“廌,解廌兽也,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征正直,解廌亦作“獬豸”、“𧈧”(音泻治)。所以“法”字的字面意思就是象神兽獬豸一样辨别、惩罚有罪的人,做到不偏不倚,均平如水,公正的规范人们的行为,做执法者的典范。根据刑法学大家蔡枢衡先生考证,“灋”字古音读废,钟鼎文“灋”借为废,废字的含义渐成法字的含义。《周礼·天官·大宰》注“废,犹遏也。”《尔雅·释言》“遏,止也”;“废,止也。”《战国策·齐策》注“止,禁也。”《国语·郑语》“废,禁也。”法是有禁止之义。又,法、逼双声,逼变为法。《释名·释典艺》“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左传·襄公二年》注“逼,夺其权势。”《尔雅·释言》“逼,迫也。”这里强调的是强制服从,乃命令之义。可见,“灋”字的含义一方面是禁止,另一方面是命令,即令行禁止的意思。不过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古代文字资料,“法”和“灋”似乎这两个字是同时存在,在社会上并行了很



图1 银川中院壁雕(局部)



图2 银川中院壁雕(局部)

长时间,到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普遍流行“法”字,不过这个字是否就是“灋”字的简化,好像有点疑问,因为这个字除了表示法律外,还经常用来表示“办法”、“手段”。根据现有材料还没有办法对这两个字的来源做出确切地划分,只能推测原来作为“去除、废弃”的动词用字的“灋”,后来渐渐开始用作名词,表示剖判是非、主持公道,与由“办法”、“遵循”意思而来的“法”字相通。到《说文解字》成书时,这两个字已经开始合流混用,因此《说文解字》才会将两个字合而为一进行解释,将“法”作为“灋”的简化字体影响到后世,“灋”字就逐渐不再使用了。

### 獬豸、獬豸冠、獬豸像

不管这两个字原意如何,至少从战国以后,獬豸成为了中华法律文明的象征。关于獬豸的形象,《山海经》说“东北荒中有兽,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说文解字》曰“解廌,似牛,一角”;汉代王充《论衡·是应》中说,“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梁元帝《金楼子》说“神兽若羊,名曰獬豸”;《墨子·明鬼》讲述了齐庄君的两个大臣王里国与中里微打官司三年不决,最终由一角神羊辨别是非的传说;《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张揖说“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廷,主触不直者”;《隋书·礼仪志》引蔡邕说“獬豸如麟,一角”。按照历史文献中对獬豸形象的描述,獬豸多是以一角羊的形象出现的(见



图3 《钦定书经图说》皋陶明刑图

图3)。根据现代考古发现,秦朝之前文物中的獬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东汉之后獬豸的形象是以一角牛的形象出现,到隋唐时期,獬豸的形象幻化为一角麟的样子(见图4),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门口就有一对铜制一角麟獬豸,它庄严威武,怒目圆睁,审视着世间的平,守卫着法律的权威。可以看出,獬豸作为中华远古先民创造出来的形象,在起先是作为一种朴素的崇拜物,是以羊或牛等牲畜的形象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獬豸的形象也在逐渐被神化,成为了一种图腾,它的形象也随着不同时代的审美观而发生改变,就像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形象,据考证它的原型是现今还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扬子鳄。按照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观点,尧舜禹是新石器时代不同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执掌神权的大祭司,那时的禅让,指的就是祭祀权的让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部落

所有事情都在围绕祭祀和征伐运行,判断是非曲直,识别善恶忠奸,由执掌神权的祭祀听命于鬼神的旨意,所以就有了“触其不直”的神明裁判。据文献记载和人类学家实地考察,神明裁判总是由神职人员或巫师们执掌。《钦定书经图说》云:“古称皋陶治狱,有罪者,令獬豸触之,殆深言其慎刑之意欤。”皋陶(音高遥,或作咎陶,咎由音同)是舜的大臣(一说是尧的大臣),负责刑狱,同时也具有了神职人员的身份。传说他的相貌奇特,吻部突出,犹如鸟喙,脸色发青,像个菜瓜,声音喑哑,很少说话。在裁判中獬豸是鬼神意志的化身,由它来判断是非曲直,皋陶只是执行者。神明裁判是各民族原始时代所通用的一种方法,他们相信只有神能洞察人的善恶邪直,当一嫌疑犯不能以人类的智慧断定他是否真实犯罪时,便不得不乞助于神灵。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验他能否逃过一危险,出生入死。古希腊人常将人浮于海上,又有人使人从悬崖跳下的习惯。非洲原始人让嫌疑犯在充满毒蛇与鳄鱼的水池里游泳过去。他们相信神对于无辜者的生命神明是不会坐视其死而不加以保护的,否则便证明他有罪,同时也就执行了惩罚。相比较,中国远古时期的神明裁判要文明许多,只是由獬豸作出判断,刑罚则由人类来实施,这是中华法律文明中“慎刑”、“礼治”法律思想在远古时期的体现。同时中国法律文明化的进程比其他民族要早,有信史记载以来即已不见有神明裁判了,后来獬豸的绝迹与其说是神兽的绝迹,不如说是神明裁判的绝迹。

“獬豸”其实也没有绝迹,它从神



图4 唐代桥陵獬豸



坛走下,活在了人世间。《后汉书》记载,传说春秋战国时,楚文王捕获到一只獬豸,并按照其形象制作了头戴的帽子,是为獬豸冠,于是上行下效,獬豸冠流行于楚国。战国末年,秦国灭楚,秦国国君将楚王的獬豸冠赐予御史、廷尉等执法者佩戴。对于这段捕获獬豸的故事已无从考据,但獬豸冠的出现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了汉代,汉承秦制,獬豸冠被称为法冠,由执法者佩戴,以示刚正不阿。《汉官仪》云:“御史服法冠,古有獬豸兽,触不直者,故执宪以其形用为冠,令触人也。”到唐、宋时代法冠皆名獬豸冠,御史服之。对于獬豸冠的样式《后汉书·舆服下》记载:“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纁为展筒,铁柱卷,执法者服之。”《旧唐书·舆服》云:“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二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因獬豸冠没有传世实物和出土文物,对其形象除了文字记



图5 清代獬豸补子

载以外,北宋礼学家聂崇义编著的《新定三礼图》绘有獬豸冠的样式可使我们窥其一二。有趣的是青海学者陈荣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并著文得出结论,藏传佛教喇嘛的法帽—夏帽就是现今还在使用的獬豸冠。根据史料记载,獬豸冠从秦代一直使用到元末,到明代乌纱帽成为官员统一用帽后才被弃用。从汉代以后,除了獬豸冠,皋陶像与獬豸图也成为衙门中不可缺少的饰品,到了明代,官服中的补服正式出现,在明朝的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即风宪官的官服上都绣有“獬豸”图案。清承明制,绣有“獬豸”补子

的补服一直使用到清王朝灭亡(见图5)。在明清时期,衙门的门口有獬豸石像,在公堂上有獬豸图案,獬豸成为了中国古代衙门的标志。古时还将秉公执法的官吏称为“獬豸”,如在《包公案》中,就将包拯比喻成獬豸,颂扬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清廉崇法、铁面无私、勤政爱民的“獬豸”,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斗,指引着我们去追寻公平与正义。

### 獬豸归来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了宣统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清王朝被推翻。清朝的灭亡,象征着中华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终结,亦在同时,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也在欧风美雨不断袭来的变革大潮中走下历史舞台。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与变革,中国法制从“全盘欧化”、“全盘苏化”的偏失到对“中国特色”法制与法学的探索,华夏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及西方先进法学思想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法治化进程日新月异,“权利”、“义务”、“契约自由”等诸多法律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同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也在反思文化的民族性和法律的民族性。法律对于一般文化的建立和发展,虽然有其极大的作用,然而法律毕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民族生活单位的文化所指示的整个趋势之下,它也不能反其道而行,如若不是这样的法律,其法律也就不能扶持其文化,甚或摧残了固有的文化。最好的立法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去创造某种法律,而是凭着自己的智慧选择出某种法律是本民族所需要的,是社会所期望的。2000年中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2001年中央公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德治确定了具体内容,2006年中央提出并倡导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丰富了德治内涵。纵观五千年中华

法制的历程,可以发现,礼义道德是其根本价值体现,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德主刑辅”、“明德慎刑”法律思想在新时期的应用,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革。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过去的传统并不只是以往的记忆,它依然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背景。而它对于今人的意义,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取舍和努力。中国古代法律以伦常为其归依,其意不独在于社会关系的协调,而是以祛除为己的主张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各民族法律虽然同是以社会和谐为其目标,但是以权利义务为其经纬的法律,只能解决纷争于事后,唯中国传统法律讲求礼义,旨在消灭争心于事先。施行权利之法,必不以多讼为怪,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却正是要至于“无讼”。所以任何民族的法律都要服从本民族文化的追求,中国古代法律文明所揭示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构想。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复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成功,更应当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等“软实力”的复兴。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法律文明的重要构成。“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温故以知新,敦厚以崇礼”。复兴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当然不是对其进行简单的恢复,而是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要有一番精密的研究检讨,不是囫囵吞枣地说它什么都是,或说它什么都非,必须根据中华民族在现阶段和未来的需要,重新评价,进行借鉴。

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獬豸形象在审判机关门前的重新立起,预示着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复兴,当然复兴的不能只是形象,更重要的是找回本本属于我们民族但却被遗失了的对于道义和公正的理解与追求。■

作者单位: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艾琳